

忆西諦先生

吳 晗

西諦先生离开我們三周年了。他那坦白的面容，爽朗的笑声，历历如在目前。

我和他相識快三十年了。那时候我还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念书，他是燕京大学文学系教授，在清华兼两点钟課，我听了他的課，从此便相識了。

西諦先生那时候已經出版了他所著的文学史，和魯迅先生合作搞箋譜，名气很大。但是，他从来沒有架子，既沒有我們清华某些鍍过金的洋教授威風，也沒有那时候社会上有些自命为大学者的不可一世的神气。他和藹可亲，談話时总是笑。特別对青年人，只要有一长可取的，便加意鼓励，总是說：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！”这两句話，后来竟成为他的口头禪。在他逝世前不久，在緬甸国庆的酒会上，他、夏衍同志和我几个人在一起談話。因为前些日子我发表了“談烟草”一文，夏衍同志也发表了談花草果木的文章，談話自然地集中在这个方面。西諦先生在談話中又接連地說：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！”我們还故意和他开玩笑。誰知道这竟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，最后一次談話呢！

我是他的学生，可是他从不以老师自居，而以志同道合的朋友待我。

一九三三年秋天，西諦先生創辦“文学季刊”，約了几个人作編輯，我記得其中有巴金、冰心、朱自清等人。我那时才是大学四年級的学生，因为經常在“清华周刊”、“清华学报”、“燕京学报”写些文章，也把我約上了。大家一談，都很贊成，刊物便办起来了。我在創刊号上发表的“‘金瓶梅’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”，他也夸奖說：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相反，清华的有些教授看了，却不大以为然。有一个老教授曾对我說：“你研究‘金瓶梅’，讲清时代也就算了，何必讲时代背景呢？”这句話需要解釋一下，話里有話，原来那个时代是不許讲馬列主义的，不但不許讲，連时代背景之类也是忌諱的。这是一个鮮明的对照。

我是个穷学生，无事不进城。有事进城，也上不起飯館吃飯。有一次进城，办完事，等回校的公共汽車，在东安市場旧书摊徘徊，忽然碰見西諦先生，他也在买旧书，一見面便問：“吃飯了沒有？”我說：“沒有。”他就請我到五芳齋吃飯。記得这次吃了鱸魚，是生平第一次吃。两人边吃边談，天南海北，談得沒个边。从此便越发熟了，見面无所不談了。

过了几个月，西諦先生离开燕京，到上海去了。一九三七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芦沟桥挑畔，占領北平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組成西南联合大学，在云南昆明开学。我先在云南大学当教授，后来又回到清华，长住昆明，和西諦先生的来往便中断了。

正当日本帝国主义瘋狂进攻，蒋介石政府連战連敗，对敌屈辱，一味退让，对内却磨刀霍霍，掀起几次反共高潮，和全国人民为敌的丑恶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，我們在昆明創辦了“民主周刊”，西諦先生在上海也創辦了“民主”。道路相隔几千里，却不約而同，在两个地方同时办了反对蒋介石、呼吁民主、要求和平的刊物。我和西諦先生虽然沒有通信，这两个刊物却又把我們联系在一起了。

一九四六年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，西南联合大学解散了，三校师生都复員北上，我也取道上海回到北平。一到上海，首先去拜訪西諦先生，一見面高兴极了，除了敘述日伪統治上海时期，他的困难遭遇以外，还談了当前的工作。他說“民主”不准备再办下去了。要取得民主，实现和平，得采用另外一个方式。他已經参加了民主促进会，要进行长期的斗争。此外，在学术工作方面，他正在編輯“中国历史参考图谱”，几十年来搜集了不少資料，要做一个初步总结，便利研究历史的人們。他的书房里，书都让了位了，一格格摆滿古代陶俑，主要是唐代的陶俑，有几个特別精美的三彩陶俑。他又指着連声說：“好极了，好得不得了！”为了购买这些陶俑和必要的資料，他欠了不少債。在編輯过程中，他自己奔走，請人照相，自己动

手剪、貼，寫說明，一個人單干，他說：“這是手工業方式，可是，有什麼辦法呢？”說了又笑了。接着又談到在抗戰前：他曾特地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訪問了傅斯年，要求看一看殷墟和其他考古資料，誰知道竟被一口拒絕，不能看。“你看，發掘經過多少年了，自己不研究，也不許人家研究，不止是資本壟斷了，連學術也壟斷了。這就是國民黨！不如此又怎麼叫國民黨呢？”說時很氣憤，說完，他又笑了，接着說：“總有這一天，這些被長期封存在庫房里的資料會重見天日的，會有這一天！”我說，“是的，不要很久，會有這一天。”

也正在這時候，國民黨通過美帝國主義的幫助，用美國飛機、美國軍艦運輸國民黨軍隊，源源北上，準備大舉進攻解放區。和軍事進攻相配合的是政治恐怖，七月十一日在昆明暗殺了李公朴，接着在十五日又暗殺了聞一多。形勢很緊張。我在上海，和同志們一道，參加了反蔣、反內戰的鬥爭，到同濟大學、大同大學、中教聯、小教聯作報告，歡送到南京請願的代表和遊行。西諦先生再三告訴我：“要警惕啊，提防有尾巴！”並且詳細描述了自己在上海多年來和特務鬥爭的經驗。他對這些人，也有一句口頭禪，那就是“壞極了！可惡極了！”西諦先生的愛和憎是非常分明的。

一九四八年八月間，我又到上海來了。原來準備第二天就趁飛機到香港，和在香港的朋友們一道進入解放區的。不料當天的報紙登載了到香港買飛機票得憑相片的消息，香港是去不成了。當天晚上就去看西諦先生，他立刻用電話通知一些朋友，一起在他家吃晚飯，商量辦法。這次在上海停留了個把月。他諄諄告誡，行蹤一定要嚴守秘密，切不可在公開場合露面。有一次，他陪我買一支自來水筆，鋪子里問要不要刻名字，我說要，提筆剛寫了吳字上半的口字，西諦先生立刻搶筆過去，代我寫了“辰伯”二字，還白了我一眼，意思是怪我太粗心了。

他知道我在等待機會進入解放區，又不能出來活動，十分無聊，就把他編輯的“玄覽堂叢書二集”和“明季史料叢書”送給我，要我寧可在家讀書，不可出門。通過他，叶聖陶先生、周予同先生、王伯祥先生還陪我逛了一趟蘇州。

一九四九年初，北平解放了，我回到了北平。不久，西諦先生也到北平來了。久別後的喜悅是無法形容的。我們同住在北京飯店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家談得高興，一瓶酒喝完了，又到外面買了十斤酒，統統喝光。

此後，見面的機會多了，談天，訪古，買舊書，經常在一起。有一次，為了尋找明景泰帝的墳墓，我們兩人在西郊南郊找了一天。後來畢竟在頤和園附近找到了，重新修繕，建為公園。記得有一次一起到琉璃廠，趙萬里先生也同去，看到一本好書，趙先生要替北京圖書館買，西諦先生也搶着買，結果還是被西諦先生買了。他對舊書是有選擇的，第一要插圖本，第二是有關戲曲的，第三是小說，只要是他所沒有的，便千方百計想法買，價錢貴一些也不在乎。以此，不少愛買舊書的朋友們，對他頗有些意見。他也知道朋友們有意見，笑着對我說：“這有什麼關係，以後還不是國家的。”果然，他逝世以後，全部藏書一萬五千多種都歸了北京圖書館。

他藏書之多，我是知道的。這些年來，他收到一些好本子，也經常找我欣賞。但是，他住的地方並不寬敞，除了書架上的書以外，大部分都裝在箱子里，並且還有一部分寄存在上海。最近讀了他的“西諦書目”，共二十七冊，沒有分類，是找人按擺書的地方和書箱藏書編列的，題簽“西諦書目”是他的親筆，中間也有個別地方經他改動。細讀之後，才知道他的興趣之廣。藏書中主要類別有戲劇、小說、畫譜、寶卷、彈詞、考古、金石、文集、詩集、詞集、目錄、方志、叢書等等，而以戲劇、小說、插圖本書為最精。除此而外，他也注意社會經濟史料，例如抄本的“光緒十九年嶺南縣保甲烟戶丁口冊”、“貴陽府屬道里冊”、“都勻府親轄村寨道里冊”、“平越府屬、黎平府屬物料價值”，和刊本的“北新關商稅則例”、“閩海關常規則例”、“同治十年廣和號刊九散膏丹集錄”等等。這一萬五千多種書，是他一生縮衣節食，四處搜訪，極一生精力得來的。他為國家積累了這筆財富，對國家對人民作出了貢獻。

三年前，在緬甸使館酒會之後，知道他出國去了，也和往常一樣，以為不久可以回來。誰知不多幾天後，在北京車站上，碰見夏衍同志，他容色慘白，低聲對我說：“告訴你一個壞消息，振鐸死了。”這簡直是晴天霹靂，一時被這消息震得說不出話來。第二天見報，才知道飛機失事的詳情。三十年的老師和朋友，就此永別了！經常關心我，鼓勵我，學術上和政治上的同志，就此永別了！

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，也参加了送葬行列，送到墓地，眼看他骨灰下葬。但是，纪念文字总是写不出来，因为一提笔就难过，就流泪，写不下去。这么一个体格健壮，永远乐观，生龙活虎般的人，怎么能忍心写他死去呢？三年了，我没有写文章。

我每一次进历史博物馆，总是想到西諦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我每一次参观革命博物馆、军事博物馆，也不由不想到西諦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同样，我每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收藏家捐献给国家以名贵图书和器物的消息，也不由自主地想到西諦先生，他要活着，该是如何喜悦。

西諦先生，你的藏书已经成为全民的财产了。你的未竟的事业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继承着。我想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也还会说“好极了！好得不得了！”的。我们就以此告慰你在天之灵吧！

西諦先生的風格 铁 弦

我国著名的作家、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先生逝世已经三周年了，在这期间，许多同志写了纪念文章，他的文集也正在出版。建国后，由于工作岗位关系，我和西諦先生时常接融，受到许多教益，并且平素又爱读他的文章，因而每逢想起他的时候，总是怀着怀念和追慕的心情。

西諦先生一生拥护真理，不断前进，嫉恶扬善，爱憎分明，他的这些美德，同志们常常提到。现在就个人的感受，想谈谈他在治学方面的风格。

第一种风格就是大家所公认的“博学宏见”。我们知道，西諦先生最早是学铁道管理的，但由于自己的努力钻研，却踏上了文学的道路。他不仅在中外文学方面，具有高深的造诣，并且旁及历史、考古、美术等等，可谓渊博淹贯，无所不通。这一点也说明他的精力过人。因为博学多闻，多才多艺，所以他留下了丰富的著作，其中包括诗歌、小说、评论、政论文、杂文、翻译作品以及文学史、美术史、目录学等论著。除了专门著作之外，西諦先生还主编了许多大套的丛书、参考工具书，如“中国版画史图录”等。他编辑这些大套书，能够从大处着眼，作长远打算，于此可看出他的卓识宏见。

解放前，他在困难条件下，独力编刊这些大套书籍是颇不容易的。建国之后，由于党对文化事业的关怀和支持，西諦先生的编书计划与旧时代不大相同，并且更加宏伟了。譬如说，他所倡议印行的“古本戏曲丛刊”已出四集，这套丛书的刊行，对古典戏曲的发掘和整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西諦先生对敦煌艺术一向重视，在他的主持下，出版了“敦煌壁画选”，前面冠以他所写的序言。另外，他倡议编刊“敦煌”大型丛刊，这部书已经订了计划，西諦先生曾一再强调要达到国际水平，并且要超过它。仅从这两个例子上，就可见西諦先生多么关心新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，而志趣又是多么宏大！

第二种风格就是“独立思考”。西諦先生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，他在治学上往往有独创的见解。以文学研究来说，他写了一部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”。虽然，书中某些观点，在今天看来，需要加以分析、批判（他自己也准备这样做，但不幸辞世），但在当时来说，仍然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书。现在，试举两点来说明他的某些创见。西諦先生编写此书，主张不必拘泥于朝代的观念。因为我国近代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人，往往因袭日本学者的见解，把王朝划分得很清楚，这样的划分，有时会抹杀两个朝代文学一脉相承的关系，例如，隋唐之间，明清之际。第二，他把此书直称为“插图本”文学史，由此可见他很重视图画在书籍中的功用。他选择的图绘都很精致，并且尽量选用了一些具有社会、历史意义的图象。中国文学史中附有多量的精美插图，在当时来讲，也是别开生面的。

再如，在逝世前不久，他编印了一部著名的画册——“中国近百年来绘画展览选集”。在画册的序言里，他批判了某些资产阶级学者，在中国绘画方面“贵古轻今”的谬见。他认为：中国近百年来来的绘画，不仅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逊色，而且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独创的风格，并产生了不少的大画家。他这种精辟的见解，在研究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

西諦先生平生自奉俭薄，唯书是好，共藏书近十万册。他生前就有化意私为公，使这份藏书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他逝世后，郑先生家属遵其遗意，已将藏书连同手稿和日记，全部捐献国家，现保藏于北京图书馆，遗藏书目不久将问世。

流光如逝，西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，但每当我们披览着经他搜藏的书籍，闻其芸香，读其题识，于是，他那坚毅而魁梧的仪容又仿佛来在我们眼前了。